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 1915-1923

張 玉 法

- 一、前 言
- 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界
- 三、新聞報導之方式與基本精神
- 四、報刊言論之方向與基本精神
- 五、結 論

一、前 言

新文化運動時期，又叫五四運動時期，或稱啟蒙運動時期。從歷史的脈絡來分析，新文化運動時期始於1915年，止於1923年，前後共八年。新文化運動時期始於1915年的理由有四：其一、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引起國人普遍的反日情緒，此種情緒，到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不能從日本手中收回山東利權，乃全面爆發起來，釀成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其二、新文化運動時期，指導國人思想新方向的主要刊物是「新青年」月刊，「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9月。其三、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課題之一是白話文運動，此運動最早由胡適於1915年發起於美國。其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重要課題是提倡科學，發起於1914年的中國科學社，到1915年改組，並創刊「科學」雜誌，為推動中國科學發展，貢獻心力。

新文化運動時期止於1923年的原因有五：其一、於1919年5、6月間達於高潮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到1923年國共兩黨開始合作進行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鬭爭，使此一鬭爭由社會及文化層面進入政治層面。其二、「新青年」從1915年9月創

刊，到1922年7月出滿第九卷休刊，完成了其思想啟蒙的任務，由思想啟蒙而造成的東西文化論爭，以及科學與玄學的論爭，發生於1922年，止於1923年。1923年6月「新青年」復刊，改爲季刊，出四期，至1924年12月停刊；1925年4月又復刊，改爲不定期刊，出五期，1926年7月正式停刊。1923年以後的新青年，已以宣揚馬克思主義爲職志，不再以文化思想啟蒙爲目的。^①其三、掀起於1915年的白話文運動，經「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之鼓吹，到1921年北京的「文學研究會」和上海的「創造社」兩大文學團體成立後，已爬上高坡。文學研究會除接辦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外，復於上海的「時事新報」和北京的「晨報」創刊「文學旬刊」，廣州分會於1923年10月創刊「文學旬刊」。創造社則於1922年5月出版「創造季刊」，1923年出版「創造週報」。而在1923年成立的文學團體，北京有「新月社」，上海有「彌灑社」，天津有「綠波社」，南京有「玫瑰社」，南通有「文藝共進社」，無錫有「湖波社」，揚州有「梅花社」，潮汕有「晨光文學社」及「彩虹文學社」，長沙有「獄雲文藝社」，成都有「草堂文學研究會」，吉林有「白揚社」等，^②由白話文運動發展而成的新文學運動，至是已普及全國，任務完成。其四、1915年10月改組的「中國科學社」於1918年自美國移國內，1920年設立圖書館，1922年起每年出版論文專刊乙冊，1922年並創生物研究所，次年獲江蘇省補助，開始研究工作。^③由此一團體爲代表的科學推動工作，可以說日臻成熟。其五、1923年受新文化運動影響所制定的新學制頒行，此一新學制由胡適主稿。

從年1915到1923年，八年的新文化運動，其內涵如何，很難界定。在運動進行期間，胡適有一段話，頗能道出大概的情況，他說：『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的新雜誌與新報紙，便可以看出兩種趨勢：在研究問題方面，我們可以指出(一)孔教問題、(二)文字改革問題、(三)國語統一問題、(四)女子解放問題、(五)貞操問題、(六)禮教問題、(七)教育改良問題、(八)婚姻問題、(九)父子問題、(十)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週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

① 參考「五四時期刊介紹」第一集（北京，1958）頁424-454。

②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篇（臺北，民國76年）第六章「文化與思想」第四節「文學藝術」（王聿均撰）頁2134-2139。

③ 同上，第二節「學術研究」（陶英惠撰）頁2029-2030。

事新報」，廣州「民風週報」……等雜誌、報紙所介紹的種種西洋學說。』^④

新文化運動時期，除了文化思想的啟蒙以外，表現在社會上的便是羣眾運動的頻繁，包括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報紙和雜誌，其較有影響力者，除對例行事務加以報導和評論外，其主要的關懷，便是對羣眾的訴求，以及對文化思想的啟蒙。

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界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界，以報紙和雜誌的從業人員為主，當時廣播、電視業尚未興起。此期間全國的報紙數目，1915年222家，其中中文報紙165家；1919年362家，其中中文報紙280家；1925年403家，其中中文報紙326家。無論從報紙總數看，還是從中文報紙總數看，報紙的數目都是增加的。僅就中文報紙而論，1919年為1915年的1.70倍，1925年為1919年的1.16倍，為1915年的1.98倍。較具有代表性的中文報紙，多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三地。此三地的中文報紙，1915年佔中文報紙總數的31%，1925年佔21%。^⑤代表性的報紙，北京有「順天時報」、「晨報」、「京報」、「益世報」等，天津有「大公報」、「益世報」等，上海有「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商報」等。另外，華南的報紙，其發行較久者，有香港的「華字日報」等。

雜誌方面，統計數字較少，僅以1921年的數字為代表。是年全年雜誌713種，但分項統計只有559種，旬刊46種，雙週刊5種，半月刊45種，月刊303種，季刊4種，半年刊1種，年刊1種。^⑥代表性的刊物，上海有「新青年」、「解放與改造」、「星期評論」、「建設」等，北京有「新潮」、「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等。上述諸刊物，多為政治性、思想性、文化性者，其他較專門的雜誌不備舉。當時的中國新聞界，係由數百種報紙、期刊，以及為此數百種報紙、期刊工作的人員所構成。但能領導新文化運動，其影響力較大者，則為較為出色的少數報刊、少數報人、以及少數記者和少數評論家。

1. 重要報刊

^④ 引見國立北京大學臺灣同學會編印「五四愛國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刊」（臺北，民國48年）頁45-46。
^⑤ 引用數字見謝蕙風「民國初年新聞自由研究（1921-1928）」（民國75年7月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3。
^⑥ 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民國55年）頁318。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重要報刊，多集中在三大區域，一為京津地區，二為京滬地區，三為穗港地區。當時的報刊，除民營者外，其影響力較大者，多屬於三個政治黨派：一派屬梁啟超所領導的憲法研究會，簡稱研究系；一派屬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一派則屬於中共或中共的前身。茲先介紹京津地區。京津地區的重要報紙有：

其一、晨報：為研究系的言論機關，是在北京地區宣傳新文化運動最有力的報紙。晨報的前身為「晨鐘報」，1916年8月15日由梁啟超在北京創刊，由蒲伯英主持，曾聘留日歸國的李大釗為總編輯。1918年9月24日，「晨鐘報」因揭露皖系軍人段祺瑞所操持的向日本秘密借款，與「國民公報」等七家報紙同為京師警察廳封閉。同年十二月，「晨鐘報」易名「晨報」出版，仍由蒲伯英主持，1919年又因著論攻擊段政府的御用國會——安福俱樂部，段祺瑞命內務總長朱深勒令停刊，不久恢復出版。此後，「晨報」大事革新，很受讀者歡迎。「晨報」本來出兩大張，共八版，第七版為副刊，專載小說、詩歌、小品和學術演講等，並有「自由論壇」和「語叢」兩欄，由孫伏園主編。1921年10月12日起，將第七版的文章改出四開單張，題名「晨報副鑄」，每天一張，每月合計一冊，叫「晨報副鑄合訂本」。「晨報」於1919年2月後的一段時間，因有李大釗的參與編務，發表了不少介紹社會主義和批評中國社會的文章。孫伏園編了三年，因鬧意見轉往「京報」。從1925年十月一日起，「晨報副鑄」改由徐志摩接編。徐志摩離開後，由瞿世英接編，在內容和精神方面大不如以前。不久奉系軍人張作霖主持北京政局，各報噤若寒蟬，「晨報」亦被利用為宣傳機關。^⑦

其二、京報：1918年10月由邵振青（飄萍）創於北京，邵無黨派色彩，以敢言著稱。1919年京報因抨擊皖系被封，邵氏潛逃上海，受日本「朝日新聞社」之聘，赴日本工作，乘機在日本研究新聞學，考察日本新聞事業。1920年直皖戰後，皖系瓦解，邵氏回國繼續辦「京報」，仍保持以往的評論政策，對北洋軍閥抨擊甚力。「京報」的主要執筆人是邵氏，據1920年5月19日胡適日記，邵氏為京報主筆。1924年12月5日「京報」增添副刊，由孫伏園主編，內容與「晨報副鑄」差不多。孫伏園後與左派文人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合流，跟主編「晨報副鑄」的徐志摩展開筆戰，1925年一月創辦「語絲」雜誌，續與「晨報副鑄」對抗。1924年前後，「京

^⑦ 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326-327；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頁49；「五四時期刊介紹」第一集頁98-99，民國10年5月19日胡適日記謂蒲伯英為晨報主筆。

報」在政治上支持馮玉祥，1924年馮氏發動首都革命，討伐直系曹錕，「京報」宣傳很力。1925年奉系張作霖與馮玉祥開戰，「京報」仍袒馮玉祥。1926年4月，奉軍打敗馮玉祥，進佔北京，乃將邵氏逮捕，以「勾結赤俄」等罪名處死，^⑧因馮同情國民黨，與支持國民黨的俄國關係密切。

其三、天津「益世報」：1915年10月10日由天主教天津副主教雷鳴遠創辦。雖是教會報紙，但政治新聞佔國內新聞一半以上，亦勇於批評。1920年雷鳴遠去歐洲，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服務，把「益世報」委託天主教友主持。1925年，該報一度被軍閥控制，其後又歸天主教友主辦。^⑨另外，雷鳴遠當時在北京亦辦有「益世報」。

京津地區的重要雜誌，都集中在北京，對新文化運動影響較大的雜誌有：^⑩

其一、新青年：月刊，1915年9月由陳獨秀創刊於上海，第一卷名「青年雜誌」，1916年2卷1號起改為「新青年」。1917年8月遷北京。由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胡適、沈兼士、高一涵等輪流主編。「新青年」努力宣揚民主與科學，並極力反對孔教、國粹與舊文學，甚至主張廢除漢文。^⑪1922年7月出滿九卷休刊。其後又兩度復刊，斷續出至1926年7月。惟1922年7月以後的「新青年」，已以宣揚馬克思主義為幟志，與1922年7月以前側重於多元思想啟蒙者不同。

其二、新潮：月刊，為北京大學學生的刊物。1919年一月創刊，1923年停刊，計出一卷1至5期、二卷1至5期、三卷1至2期，共十二期。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由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編輯，五四以後不久，傅、楊出國留學，由羅家倫主編，羅出國後由周作人主編。內容上屬於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派，「發刊詞旨趣書」中指出該刊以批評為精神，但謂「以批評為精神，自不免有時與人立異。……如不以立異為心，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雖言詞快意為之，亦無傷德義」。^⑫

其三、每週評論：週刊，1918年12月22日由陳獨秀、李大釗等創刊，1919年8月31日第37期出版時，為警廳封禁。該刊為小型報紙型，每星期日出版四開一張，分四版，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

^⑧ 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327-328；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頁49。

^⑨ 馮愛羣編「中國新聞史」（政工幹部學校，民國55年）頁267；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頁49-50。

^⑩ 除另註明者外，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民國15年）頁194-195。

^⑪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民國64年）第一冊，頁191。

^⑫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75、396。

況、通訊、評論之評論、新刊批評等欄。發刊的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並謂「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⑬

其四、努力週報：自由派的刊物，1922年5月7日由胡適創刊，為四開報紙型，其宗旨在提倡好人出而努力，改造國家社會。胡適以「努力歌」為發刊詞，詞云：「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又云：「阻力少了，武力少了，中國再造了。」又聯絡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幹、陶行知、李大釗、朱經農、高一涵、丁文江等共十六人，於努力週報第二號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憲政政府。^⑭1923年胡適因身體不適，向北京大學請假一年，是年四月南下杭州養病，努力週報出至是年十月停刊。^⑮

京滬地區的報刊，以上海為中心。在報紙方面，重要的有：

其一、上海「時事新報」：其前身為「時事報」，創刊於1907年。1909年與「輿論日報」合併，稱為「輿論時事報」，1912年復稱「時事報」，1916年5月18日才為改「時事新報」。^⑯「時事新報」是上海地區宣傳新文化運動最早和最有力的報紙，該報屬研究系，與北京「晨報」相呼應。梁啟超、張東蓀、藍公武等人在政治上不得志，致力於文化革新，使「時事新報」成為鼓吹新文化運動的刊物。「時事新報」最有名的是於1918年3月4日增闢的「學燈」副刊，專門刊登介紹學術、討論思想的文字，很受教育界的歡迎。「學燈」於發刊時本來是週刊，同年五月改為半週刊，十一月改為每週三次，十二月起改為日刊。「學燈」的內容很廣泛，包含「文學旬刊」、「現代婦女」、「藝術」、「青光」、「戲劇」等各種週刊，該刊先後主持人為宗白華、郭虞裳等。著名的作者有梁啟超、張東蓀、藍公武、王光祁、郭沫若等。「時事新報」在專欄新聞方面，也居開創的地位，從1919年起有「教育界」一欄。^⑰

其二、上海「時報」：1904年由狄葆賢創刊，原屬立憲派的報紙，民國初年與梁啟超接近，後漸分離，亦從事新文化運動。從1914年起，陸續增闢教育、實業、婦女、兒童、圖書、文藝等附張，1921年狄氏因病將報紙轉售給黃承恩。1927年北

^⑬ 同上，頁42-43。

^⑭ 胡適日記手稿本，第三冊。

^⑮ 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簡編」（臺北，民國60年）頁23-24。

^⑯ 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頁50。

^⑰ 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324-325。

伐軍至上海後，報紙改組，戈公振離開，由「申報」總理張竹平接管，請陳布雷任主筆。^⑱

其三、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1月22日由陳其美創刊，屬國民黨系的報紙，葉楚傖任該報總主筆，編輯邵力子任總經理兼副刊編輯。1918年6月16日該報增闢「覺悟」副刊，專門登載與新文化運動有關的文章，深受青年人歡迎。該報後由陶百川主持，對國民黨的主義多所宣傳，至1932年因日人壓力而停刊。^⑲

其四、上海「商報」：1921年1月1日由湯節之創刊，陳訓正任總編輯，陳從弟訓恩（布雷）為編輯主任兼主筆，潘公展為電訊編輯。「商報」言論敏銳，對直系軍人出身的總統曹錕攻擊甚力。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商報力表同情與支持。^⑳

京滬地區的重要雜誌，亦以上海為中心，著名的有：^㉑

其一、上海「解放與改造」：半月刊，1919年9月創刊，為研究系的機關報，第一卷出八期，第二卷出十六期，均為32開，第三卷更名「改造」，為16開本，每卷十二期，出至四卷10期（1922年9月）停刊。第一、二卷主編為張東蓀，三、四卷為梁啟超。^㉒該刊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合自然、不合理的狀態，同時介紹世界新潮，以為改造地步，內容有評壇、論說、讀書錄、世界觀、思潮、社會實況、譯述等欄。

其二、上海「建設」雜誌：月刊，1919年8月1日由孫中山創刊，為國民黨的機關報，總編輯為胡漢民，編輯有朱執信、廖仲愷、戴傳賢等。前後出版23期，至1920年12月三卷一期後，因國民黨人大都離滬赴粵從事實際革命工作，雜誌停刊。內容分論說、紀事、通信及雜錄四類，所論多為國際問題、社會改造、新思潮，很少討論時局。^㉓

其三、上海「星期評論」：1919年6月8日創刊，為國民黨人所辦，戴傳賢、沈玄廬主編。該刊為小型報，四開一張，分四版，每週日出版，隨民國日報附送，志在以革新思想著手以改造中國，共出53期，1920年6月6日停刊。^㉔

^⑱ 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325；袁祖超「中國報業小史」頁51-52。

^⑲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臺北，民國78年）頁83-84；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325-326；袁祖超「中國報業小史」頁51。

^⑳ 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329-332。

^㉑ 除另註明者外，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193-194。

^㉒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353-354。

^㉓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61-65。

^㉔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62-166；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49-59。

穗港地區，中文報紙不少，率多短命。其歷史較久者，為香港「華字日報」。該報創於1864年，原為「德臣西報」的中文版，到1919年，脫離德臣西報，另組有限公司，業務日漸發展。²⁵

2.重要報人

前述重要報紙之所以能造成較大之影響，主要因有卓越的編輯、主筆和記者，有時與報紙出資人亦有關係。此處僅列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十二人於下：

一、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康有為弟子，舉人出身。1895-1898年間從康有為運動變法，曾主編上海「時務報」。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鼓吹立憲，先後在日本主編「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並遙領上海「國風報」筆政。民國建立後，自日返國，先後組「民主黨」、「進步黨」、「憲法研究會」（研究系之稱原於此），並先後辦「庸言報」、「大中華」雜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上海「時事新報」、北京「晨報」，都與梁有密切的關係。梁曾於1913年任司法總長、1917年任財政總長，一次大戰後赴歐考察，歸國後專從事教育文化事業。²⁶

二、孫伏園（1894-1966）：原名福源，字伏園，以字行。浙江紹興人，浙江省第五中學畢業，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在北大肄業時，乃轉入「晨報」當記者。1919年1月北大學生創辦「新潮」月刊，伏園加入為社員。1921年1月與周作人、鄭振鐸等在北京發起「文學研究會」，以「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1921年10月「晨報副鐫」創刊，由伏園主編。1924年10月，伏園辭「晨報副鐫」職，12月應「京報」主人邵飄萍之約，為「京報」創刊「京報副刊」。²⁷

三、邵飄萍（1884-1926）：名振青，筆名飄萍。浙江金華人，秀才出身，杭州高等學堂畢業。曾任上海「申報」特約通訊員、浙江都督府「浙江公報」編輯。1912年與杭辛齋在杭州創刊「漢民日報」，1914年報紙被封，遂東渡日本，入法政專門學校，同年設「東京通訊社」於東京，為京、津、滬各大報供應東京通訊。1916年歸國，任上海「申報」、「時報」及「時事新報」主筆，後任「申報」駐北京特派員。1918年7月創「新聞編譯社」於北京，10月發刊「京報」，自任社長。

²⁵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77；馮愛羣「中國新聞史」頁268。

²⁶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民國64年）第一冊，頁158-159。

²⁷ 同上，頁145-146。

1919年五四運動起，「京報」因抨擊皖系、同情學生被封，飄萍潛逃赴滬，後應大阪「朝日新聞社」之邀赴日，任特約記者。1920年5月，段祺瑞下野，飄萍由日返國，在北京續辦「京報」，續抨擊軍閥勢力。1925年國奉戰爭爆發，「京報」同情國民軍，次年奉軍入京，乃將「京報」封閉，並以「宣傳赤化」等罪名，將飄萍槍斃，年僅43歲。^⑳

四、雷鳴遠（1877-1940）：比利時人，天主教徒，中學畢業，1901年來中國傳教，升為司鐸，1906年九月受任天津總堂區總鐸，1910年在天津創法政學堂，任社會學教授。1915年十一月十日在天津創刊「益世報」，次年又在北京創刊「益世報」。1920年返歐發動協助中國留學生事宜。1923年在巴黎創辦「中國公教青年會」，1927年返回中國，改入中國籍。^㉑

五、張東蓀：浙江杭縣人，1877年生。日本東京哲學館畢業，清末梁啟超辦「國風報」，張東蓀曾在該刊撰稿。民國建立之初，先後在上海「大共和日報」（1912年章炳麟辦）、天津「庸言」雜誌（1912年梁啟超辦）、上海「大中華」雜誌（1914年梁啟超主編，中華書局發行）、上海「正誼」雜誌（1915年谷鍾秀辦）、上海「中華新報」等報刊撰稿，言論傾動一時，對袁世凱稱帝，尤大加筆伐。嗣任上海「時事新報」總編輯，並創刊「解放與改造」雜誌。其後曾任國立南京政治大學教授、光華大學文學院長，1934年入國家社會黨，1949年後曾任民盟常委。^㉒

六、藍公武：江蘇吳江縣人，1886年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平素私淑梁啟超，辛亥革命後，任梁派所辦北京「國民公報」及天津「庸言」雜誌主筆。1913年為江蘇省選出之參議員，入進步黨。1914年留學德國，次年歸國，任北京「大中華日報」記者，對袁世凱帝制極力反對，1916年並從梁啟超入廣西，從事反袁運動。袁死後，國會恢復，仍任參議員，次年國會解散。1918年選為安福國會議員，同時任北京「國民公報」社長，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國民公報」強力支持。次年，「國民公報」被迫停刊。其後，與梁啟超接辦「解放與改造」雜誌，1922年國會恢復，再為參議員。^㉓

^⑳ 同上，第四冊（臺北，民國70年），頁159-160。

^㉑ 趙雅博「烽火中的雷鳴遠」（臺北，民國54年）頁250-254。

^㉒ 田原禎次郎編「現代支那官紳人名錄」（北京，1918）頁437-438；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支那人名鑑」（東京，1928）頁129；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1927）頁344；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監修「現代中國人名辭典」（東京，1966）頁639-640。前二書均謂張為江蘇吳縣人。

^㉓ 田原禎次郎編「現代支那官紳人名錄」頁762；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支那人名鑑」頁587；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頁526。

七、狄葆賢：字楚青，江蘇溧陽人，1875年生。早年參與戊戌變法，事敗後亡命日本。1904年在上海創刊「時報」，致力於立憲運動，並辦「有正書局」，1909年任江蘇諮議局議員，1911年至北京創刊「京津時報」。1914年與梁啟超一派斷絕關係，獨力經營「時報」。到1918年時，狄葆賢所辦的報業，由其弟狄南士經營，已則致力於佛學研究。^② 1921年將「時報」售給黃承恩。

八、戈公振（1890-1935）：原名紹發，號公振，以字行。江蘇東臺人，高等學堂肄業、神州法政學堂肄業。1913年赴上海，任職狄葆賢之「有正書局」，後轉入狄氏之「時報」。公振在「時報」，初任校對，後升為本埠新聞版編輯，再升為總編輯，前後服務「時報」達十五年之久。1925年在國民大學講授「中國報業史」，1926年在復旦大學講授「中國報業史」。^③

九、葉楚傖（1887-1946）：江蘇吳江人，蘇州高等學堂肄業，同盟會員。清末革命時，曾主汕頭「中華民國報」、上海「民立報」筆政，並加入文學團體「南社」。民國建立後，先後在上海主編「生活日報」及「民國日報」，尤其對「民國日報」負責最久、貢獻最大。狄君武說：「當年的民國日報，家無隔宿之糧，全靠他一力支撐；文章出自他胸中，錢要靠他奔走，捕房來找麻煩，還要他去吃官司。」^④

十、陳訓正（1873-1944）：筆名屺懷，浙江慈谿人，舉人出身，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09年任浙江諮議局議員。1910年湯壽潛創「天鐸報」於上海，陳訓正任社長，主筆政者有戴傳賢等。1911年夏辭職歸鄉，辛亥革命起，在鄉響應革命。1912年在上海主編「生活雜誌」，嗣於寧波辦孤兒院。1920年12月佐湯節之（或云李徵五）創辦「商報」於上海，任經理兼總編輯，由從弟訓恩（布雷）任編輯主任兼主筆。該報抨擊軍閥甚力。1927年北伐軍抵浙江，成立浙江省政府，訓正任省府委員，布雷任省府秘書長。^⑤

十一、陳布雷（1890-1948）：原名訓恩，外號布雷。浙江慈谿人，浙江高等學堂畢業。1911年秋應上海「天鐸報」之聘，任撰述記者。1912年辭職歸里，任教於中學，兼「申報」特約譯述員，並加入同盟會。1920年兼任「四明日報」撰述。

^② 田原頴次郎「現代支那官紳人名錄」頁218；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支那人名鑑」頁754；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頁412。

^③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三冊（臺北，民國69年），頁14-15。

^④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頁226。

^⑤ 同上，第九冊（臺北，民國76年）頁289-294。

1921年1月任上海「商報」編輯主任。1927年2月加入國民黨。^⑥

十二、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吳興人，上海聖約翰大學外文系肄業，1918年任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特約撰稿，1919年任上海「民國日報」特約撰稿。1921年任上海「商報」電訊編輯，並撰寫時評，是年兼寫「商報」星期日社論專欄「每週大事述評」，至1926年代理陳布雷之編輯主任職務，同年轉入「申報」主編要聞，1927年二月與陳布雷同時加入國民黨。^⑦

上述十二人，一部分屬研究系，一部分屬國民黨，一部分無黨派色彩，均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重要報人，對當時的政治、文化、思想發生一定的影響。

3.重要期刊作者

期刊作者也常是報紙作者，因為他們主要以期刊為園地，而期刊所發表的文字，不一定直接與新聞有關，卻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指針。此類作者，也舉十二人於下：

一、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秀才出身，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肄業。1903年在安徽組「愛國會」，又與章士釗等創刊「國民日日報」，宣傳革命。1904年在蕪湖創刊「安徽俗話報」。民國成立，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走日本，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1915年夏返國，於上海創刊「青年雜誌」，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1917年2月於「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除主編「新青年」外，又兼「中華新報」筆政。1917年8月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出任文科學長。「新青年」亦遷北京出版。1918年底，獨秀又與李大釗創「每週評論」，以討論實際政治為主。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獨秀被捕，入獄三月。出獄後，辭北大職赴滬。1921年7月，中共召開一全大會，獨秀被推為總書記。1922年8月創刊中共機關報「嚮導周報」，主筆政。1927年8月，因與國民黨的合作失敗，被辭去總書記職務。^⑧

二、李大釗（1888-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天津北洋法政學堂畢業，1912年入中國社會黨，次年中國社會黨解散，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經濟學。1916年返國，受聘為研究系機關報晨鐘報（1918年易名為晨報）之主編。1917年8月之後，與陳獨秀等五人輪流主編「新青年」。1918年2月受聘為北

^⑥ 同上，第一冊，頁183-184。

^⑦ 同上，第三冊，頁308。

^⑧ 同上，第一冊，頁190-192。

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離開「晨鐘報」。是年9月，以毛澤東為北大圖書館助理員。12月與陳獨秀等創刊「每週評論」。1919年7月與王光祈等成立「少年中國學會」，並任「少年中國」雜誌編輯主任。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八月在北京成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九月辭北大圖書館主任，仍任北大教授，兼蔡元培校長秘書。1923年國民黨開始聯俄容共，李大釗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1924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一全大會，李大釗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兼北京支部總幹事。1927年4月，為北京政府拘捕處死，年四十歲。³⁹

三、蔡元培（1868-1940）：字子民，浙江紹興人，進士出身，曾任浙江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上海「中國教育會」會長，1902年在滬辦「愛國學社」，教育革命青年。1903年創辦「俄事警聞」，次年改名為「警鐘日報」。1904年秋光復會成立，當選會長。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赴北京任譯學館教習。1907年赴德留學。民國成立，出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旋復赴德研究。一度回國，又赴法國。1916年底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⁴⁰元培主張教育獨立，思想自由，不僅以此為辦學理念，且常發表文章於「新青年」等雜誌。

四、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谿人。1906年就讀上海「中國公學」，並開始在「競業旬報」發表文章。1910年公費留美，初入康乃耳大學習農業，又改習政治、經濟，兼治文哲，1914年6月畢業。1915年9月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並開始提倡文學改革，1917年1月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是年五月通過博士學科考試回國，八月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4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理論」。在北大任教期間，除與陳獨秀等輪流編輯「新青年」、「每週評論」外，並發刊「努力週報」，發表論學及評論政治的文字甚多。⁴¹

五、吳虞（1872-1949）：字又陵，四川成都人，1905年入日本法政大學肄業，抗言非孔。1907年畢業返國，任成都府立中學教員，並一度主編「蜀報」，時為反孔非孝之論。又因曾毆傷乃父，四川教育界簽名指斥，將之逐出教育界。1913年夏在成都「醒羣報」發表家庭革命、宗教革命言論，嗣主編「四川政報」。1915年著論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3月入「南社」。時所作反孔文章，成都報刊均不登

³⁹ 同上，頁72-74。

⁴⁰ 同上，頁247-248。

⁴¹ 同上，頁104-106。

載，乃寄「新青年」等雜誌發表。其「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文，皆發表於「新青年」。1921年5月應聘至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與胡適、周作人等往來甚密。後以言論不馴，「晨報副鐫」時有文批評之。1925年8月辭北大職返蜀任教。^④

六、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江南礦路學堂畢業，1902年留日，入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肄業。1904年畢業後，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肄業。1906年棄醫習文，常有譯著發表。1909年回國教書，1911年冬任浙江山陰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民國成立，先後任教育部科員、科長，1918年1月任「新青年」編輯委員，是年5月於「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1920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系兼任講師。1921年12月，「阿Q正傳」在「晨報副鐫」開始連載，至1922年2月完畢。1924年參與發起「語絲」週刊，此後在「語絲」發表小說、雜文、詩、譯文等一百三十九篇。^⑤

七、周作人（1884-1966）：浙江紹興人，江南水師學堂肄業，1906年留日，翌年入私立法政大學肄業，又入立教大學修古希臘文。1911年歸國，服務於浙江教育界，1917年北上，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後加入「新青年社」，於「新青年」發表普羅文學作品，介紹「新村」生活，提倡人道主義及「人的文學」。1920年10月任「新潮」編輯主任，1921年1月與鄭振鐸等成立「文學研究會」。1924年冬與孫伏園及乃兄樹人等創刊「語絲」週刊。^⑥

八、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天津府立中學堂畢業，1916年秋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此後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響應文學革命。1918年夏，與同學羅家倫等創刊「新潮」月刊，宣揚新文學，提倡新思潮。1919年北大畢業後，官費留英，1923年又由英赴德，至1926年冬始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回國。^⑦

九、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主修外國文學，與傅斯年等過往甚密。時新文化運動方興，乃於1919年1月與傅斯年等創刊「新潮」月刊，該刊用新標準估量舊文化、用新文學表現新人生、用新態度促進新社會，風行一時。五四運動發生，家倫被推為代表，到各使館送遞意見

^④ 同上，第六冊（臺北，民國73年）頁115-118。

^⑤ 同上，頁432-436。

^⑥ 同上，第三冊，頁80-81。

^⑦ 同上，第一冊，頁207。

書。1920年得獎學金留美，1922年由美赴英，1923年由英赴德，1925年由德赴法，1926年返國，入北伐軍總司令部工作。^{④⑥}

十、戴傳賢（1890-1949）：字季陶，四川漢州人，日本大學法科畢業，初以天仇為筆名，在上海「天鐸報」等發表時論，嗣至南洋檳榔嶼主編「光華報」，並加入同盟會，1912年在上海創刊「民權報」，受知於孫中山，任機要秘書。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戴任秘書長。1918年隨孫中山離粵赴滬。1919年在滬辦「星期評論」，並襄助「建設」雜誌編務。1921年隨孫中山去粵，次年復返滬。1924年國民黨一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④⑦}

十一、沈定一（1892-1928）：號玄廬，浙江蕭山人。早年留學日本，研究法律，並加入同盟會及光復會。1912年被選為浙江省議會議員，並被推為議長。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潛心研究政治。1916年回國，仍任浙江省議會議長。1917年胡適、陳獨秀等在「新青年」倡文學革命，定一撰文響應。1919年6月8日，與戴傳賢等創「星期評論」於上海，隨民國日報附送。1919年6月16日，民國日報關「覺悟」副刊，由邵力子主編，定一時於「星期評論」及「覺悟」發表詩文。1920年5月與陳獨秀、戴傳賢等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又稱中共臨時中央，旋即與戴傳賢等退出。1923年曾隨蔣中正赴俄考察，1924年國民黨一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委。^{④⑧}

十二、廖仲愷（1878-1925）：原籍廣東惠陽，生於美國，幼在美求學，十七歲回國，在香港英文學校就讀，嗣留學日本，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1905年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任職廣東省政府，後為中華革命黨理財。1919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創刊「建設」雜誌。仲愷與胡漢民、戴傳賢等任編輯，仲愷在「建設」發表論文至夥，主要在宣揚民生主義及民權主義方面。1921年5月任廣州政府財政部次長，此後佐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政策，1924年國民黨一全大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任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旋在廣州被刺殞命。^{④⑨}被刺的原因，一般相信與其堅持容共政策有關。

前述十二人，部分為自由派，部分為國民黨人，部分為由自由派轉為中共黨人

^{④⑥} 同上，頁287-288。

^{④⑦} 同上，頁278-279；簡笙簧、侯坤宏編「戴傳賢與現代中國」（臺北，民國77年）頁444-445。

^{④⑧}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臺北，民國66年），頁423-436。

^{④⑨} 同上，頁256-258。

者。他們的言論，大體能涵蓋當時主要言論的方向。當然，還有些特殊的作者，如宣揚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復，此處無法一一列舉入。

三、新聞報導之方式與基本精神

本節主要探討三部分，即新聞報導的基本關懷、專電與新聞的處理方式、以及新聞報導的基本精神，茲分述如下。

1. 新聞報導的基本關懷

新文化運動時期，報紙的新聞來源約有五種：其一、本館訪員之所記錄，如專電及特約通訊。北京與上海為政治與商務之中心，有專任訪員駐其間，所得新聞，常以專電送達本報，為一報所獨有。另有特約通訊，多就地招聘，其新聞常兼見二、三報以上。其二、為通訊社所送，分為要電與新聞二種，大率電報多出自外人通訊社，而本國通訊社亦間有之；新聞則多出自本國通訊社。其三、為譯報，以翻譯該報所在地之英日文報紙為多。其四、為剪報，係轉載他報之新聞。其五、為投稿，即公共機關及個人所公布之稿件。^⑤

當時的報紙，由本報記者直接採訪而得的新聞在比例上不高，但新聞來源仍然相當豐富。在眾多的新聞來源中，新聞版資料的採集者，以及新聞編輯，其關懷的廣度與深度如何？由於全國的地區廣大、報紙眾多、時間甚長、資料不全，無法全面分析。戈公振曾於京、津、滬、漢、粵五地報紙各取一種，即上海「申報」、北京「晨報」、天津「益世報」、漢口「中西報」、「廣州「七十二行商報」，由1922年十一月十日起，積累四十日，而統計分析之，得出下列之結果。在新聞之分類方面，分為七大項、二十七小項：

A、政治新聞，包括六大類：

- a、內訌：指內戰。
- b、內閣：指組閣、倒閣及有關內閣之各類新聞。
- c、議會：指縣議會、省議會及國會一切消息。
- d、外交：指對外一切交涉，無論地方、中央均屬之。
- e、生計：指委任、撤任、鬧薪、裁薪。
- f、和議：指統一、議和、休戰。

^⑤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16。

B、經濟新聞

- a、公債：指內債、外債、路債。
- b、產業：指商務、農業、工業。
- c、勞動：指罷工、加薪、示威。
- d、物價：指匯水、物價、市價、行情。
- e、交通：指鐵路、輪船、郵電。
- f、稅務：指常關、海關、釐卡。
- g、金融：指銀錢、行市、擠兌。
- h、財政：指整理、清理、籌款、過關。

C、文化新聞

- a、教育：指學校風潮、學界新聞。
- b、演講：指學術演講、名人演講。
- c、戲劇：指新舊劇、電影。

D、社會新聞

- a、窮困：指窮困、自殺、餓死。
- b、遊藝：指運動、球戲、賽馬、賽槍。
- c、土匪：指攻城奪地、綁票、劫人之土匪。
- d、集會：指開會歡迎、歡送、追悼。
- e、訴訟：指民事及刑事。
- f、慈善：指施粥、施衣、施棺。

E、罪惡新聞

- a、殺傷：指傷人、殺人、暗殺。
- b、偷騙：指偷、拐、騙。
- c、搶奪：指盜劫行爲。
- d、煙賭：指種煙、煙稅、私吃、聚賭。

F、雜項：指一切新聞不能歸入以上各目者。

上述分類，未盡妥當，如罪惡新聞與社會新聞即有牽混之憾。^⑨政治新聞中，總統與政黨消息亦不知歸於何類。

^⑨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11-213。

在報紙中的新聞版面與非新聞版面的分配上，前述五大報的情形可列表比較如下：^②

	上海 申報	北京 晨報	天津 益世報	漢口 中西報	廣州 七十二行商報
新聞(%)	28	34	20	33	39
非新聞(%)	72	66	80	67	61

可以看出「益世報」新聞最少，只佔五分之一；次為「申報」，不足三分之一；再次為「晨報」及「中西報」，約三分之一；七十二行商報新聞最多，約佔五分之三。

國內外新聞版面的比，五大報的情形可列表比較如下：^③

	上海 申報	北京 晨報	天津 益世報	漢口 中西報	廣州 七十二行商報
國內新聞(%)	96	82	96	97	100
國外新聞(%)	4	18	4	3	0

可以看出北京「晨報」較具世界觀，國外新聞幾佔五分之一；「申報」、「益世報」、「中西報」的國外新聞僅聊備一格，不過佔百分之三·四，「七十二行商報」則全無國外新聞。

在國內新聞方面，五大報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罪惡新聞關懷的程度，可列表比較如下：^④

② 同上，頁216。

③ 同上，頁217。

④ 同上。但「中西報」百分比總數少0.4%，七十二行商報多0.5%。

	上海 申報	北京 晨報	天津 益世報	漢口 中西報	廣州 七十二行商報
政治新聞 (%)	24.6	39.3	51.4	49.1	23.8
經濟新聞 (%)	33.7	27.7	19.3	18.3	15.9
文化新聞 (%)	7.4	9.1	4.3	3.7	12.3
社會與罪惡新聞 (%)	18.3	14.9	13.4	20.5	39.2
其他新聞 (%)	16.0	9.0	11.6	9.0	8.3

可以看出「益世報」與「中西報」最重視政治新聞，約佔二分之一；「晨報」次之，約佔五分之二；「申報」及「七十二行商報」最不重視，約佔四分之一。在經濟新聞方面，「申報」最重視，約佔三分之一；次為「晨報」，超過四分之一、不足三分之一；「益世報」、「中西報」、「七十二行商報」均在五分之一以下。社會及罪惡新聞方面，最重視者為「七十二行商報」，約佔五分之二，「中西報」約佔五分之一，「申報」不及五分之一，「晨報」不及七分之一，「益世報」約八分之一。在文化新聞方面，「七十二行商報」最多，約佔九分之一，次為「晨報」約佔十一分之一，再次為「申報」約佔十三分之一，「益世報」與「中西報」均在二十分之一以下。

從新聞編輯的立場來看，當時的新聞報導有許多缺點，譬如敘述一事，常常首尾不具，前後矛盾；又如同樣一事，一日散見二、三處。據戈公振的了解，申報、晨報、益世報、中西報、七十二行商報中，以晨報只有兩張編輯最精，專電俱有題目，且與新聞合登，重要者排列在前，不問其為京內京外之事。其他報紙，申報五張、益世報及中西報各四張，七十二行商報三張，紙張愈多者，分欄亦愈多，支離破碎，毫無生氣。⁵⁵

2. 專電與新聞的處理

新聞版的內容，除評論外，有特電（專電）、特約電、特約通訊、文書原件（約章、命令、電文等）等。特電為本報特約之記者採得重要消息，簡要拍回報社，專供本報之用。如北京報紙有記者駐上海，上海報紙有記者駐北京，而1919年至1922

⁵⁵ 同上，頁218-231。

年間，各報派往巴黎和會、國際聯盟以及華盛頓會議之記者亦所在多有。^{⑤⑥}此類特電，以香港「華字日報」為例（上海「民國日報」稱專電），如1919年5月12日該報載有5月10日上海特電，報導正在上海從事南北議和的代表，於5月9日的會議中磋商外交問題，決議致電巴黎陸、王、顧三代表，對於山東事勿簽約。^{⑤⑦}又如1919年5月16日該報載有5月15日上海特電，報導（外交總長）陸徵祥電京，謂日本不允交還青島，即在和約中加入青島交還一款，亦極反對，並謂伊將在大會提出抗議，然後拒絕簽押。^{⑤⑧}

特約電即外國通訊社之電，或稱外電，以上海「民國日報」為例，如1919年5月10日該報有六則特約電，其中英國路透社二則、日本東方通訊社四則。路透社五日巴黎電云：「中國代表發表宣言，批評和會關於膠州之決議，謂此項決議，予日本以權利，較承繼山東德人原有權利所得者為尤多，並予日本以政治上之優勢，足為中國主權與土地完全之危害。」東方通訊社九日東京電云：「據日本當局者云：此次北京之騷擾，雖以日本不交還青島之說為其一因，但此說實係意外之誤報，蓋交還青島，早已不成問題，日本當然不久將決行交還青島也云云。」^{⑤⑨}

特約通訊，為外埠特約訪員所供之稿，如1919年5月15日北京「晨報」刊載「留東學界風潮昨訊」，即為東京特約通訊，報導留東學生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提最後通牒之日）欲借公使館開紀念會，引起日警干涉，當場逮捕學四十餘人之事。^{⑥⑩}5月20日該報對此事件續報，^{⑥⑪}以及5月29日該報所載「山東問題與日本黨爭」，^{⑥⑫}均為特約通訊。

文書原件有許多種，一種為約章，如載於1919年5月14、15日「晨報」三版的「歐洲和約詳細內容」；二為命令，如1919年5月15日北京「順天時報」二版所載為鎮壓學生運動由大總統所下之「軍警共維秩序之明令」及「學生干政之訓誡令」；三為電文，如1919年5月14日「晨報」所載「康有為請誅國賊救學生電」以及1919年5月11日「晨報」所載「各方對學生之同情電」。

他報新聞，為選自或譯自他報之新聞，如關於五四學生運動，1919年5月7日

⑤⑥ 同上，頁196-197。

⑤⑦ 民國八年5月12日「華字日報」。

⑤⑧ 民國八年5月16日「華字日報」。

⑤⑨ 民國八年5月10日「民國日報」。

⑥⑩ 民國八年5月15日「晨報」。

⑥⑪ 民國八年5月20日「晨報」。

⑥⑫ 民國八年5月29日「晨報」。

上海「時報」載有「北京學生界之大示威」，分載北京「益世報」、「晨報」、「京報」對北京學生運動之記載。次日該報又載有「北京學生示威之西訊」，分載上海「大陸報」、「字林報」、「英文滬報」等對於北京學生運動之報導。

前述新聞版面之資料，通常依其重要性編排，1919年5月7日上海「民國日報」，首為本社專電，次為特約電，再次為要聞，是為一例；1919年5月8、9、10日北京「晨報」，首為緊要新聞，次為一般新聞，是為另一例。

在新聞處理上，最顯著的弊端有二：一為新聞與評論往往合而為一，記者往往有意左右讀者視聽。其二，新聞報導每有政治立場，往往各說各話。這兩樣弊端，自然也見於其他時期的報紙。

所謂新聞與評論合而為一，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夾敘夾議，在當時尚少；另一種情形是新聞的首尾，時有主觀的評論，這在當時甚為普遍。僅於北京「晨報」摘取數例如下：

第一個例證是：1919年5月9日「晨報」二版緊要新聞報導巴黎和會中中國對收回山東之交涉失敗，主標題為「嗚呼大事去矣」、副標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新聞首段云：

諸君：我之山東問題已完全失敗矣！今後之山東，名義上雖屬中國，而實質上則為日本所有矣，豈不哀哉！政府至今隱蔽不宜，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吾儕今日苟不自圖補救，則束手待斃，尚有倖哉！

又是年5月12日該報二版緊要新聞報導巴黎和會對德和約中有關山東問題之規定，主標題為「我國民承認此種和約耶」、副標題為「請看列強對華問題之處分」新聞末段云：

據上以觀，歐戰以前德國在華之各種特權，當然由我國無條件收回者，在一般條件中，尚且受各種束縛，其餘關於山東問題之規定，更屬本末倒置。我國參戰經年，而所獲之成果乃僅此數，不知政府國民對此屈辱條件將作如何感想也。

第二個例證是：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中爭取收回山東利權失敗，學生運動風起湧，引起北京教育界之不安，1919年5月13日「晨報」二版緊要新聞中的一則報導，主標題為「雨黯風悽之北京教育界」，內容分別報導教育總長出走、各校學生演講、專校校長相繼辭職、教部派員挽留等，新聞首段云：

自外交問題危急以來，北京教育界頗是一種飄搖不安之景象。日來風雲慘

淡，人心徬徨，實為從來所未有者。

次日該報對上述新聞續報，主標題為「教育界之人心惶惶」，新聞首段云：

連日因外交問題牽動學界，又因當局處置無方，致各校長紛紛辭職。教育界既呈一種不安之景象，教育總長無法，遂出於出走之一途。

第三個例證是：對1919年5月7日留東學界因紀念五七國恥日受到日警干涉的報導。是年5月17日、18日「晨報」六版之新聞，主標題為「國恥紀念日學生被辱事件真相」，新聞首段為：

五月七日為我中華民國四年日本以最後通牒逼我承認二十一苛刻條件之日，奇恥大辱，凡屬中華國民，當無不切齒痛心，永矢勿諼者也。

新聞末段云：

昨據東京電云：被拘入獄之十一名留學生業由檢所以傷害罪或妨害公務執行罪提起公訴。……嗚呼！此十一名留學生不幸受日本法律之制裁，其無辜也宜哉！雖然，此十一名愛國留學生之犧牲，果能為國人覺醒之動機，則此犧牲始大有價值矣！國人勿忘。

上述三個例證，可以明顯表示新聞處理的主觀性，不僅在字裏行間，且直接發為議論矣！

所謂新聞報導有政治立場，是指新聞報導不中立，往往各說各話，無論字裏行間，或發為議論，均對某一事件表示明顯的支持或反對。以1919年的五四學生運動而論，天津「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北京「晨報」等都極支持。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運動起，次日「大公報」刊載北京特約通訊一篇，主標題為「北京學界之大舉動」，新聞一開始便說：

歐議中之青島問題，至近日形勢大變，我國朝野均奮起力爭，而北京學界尤為憤激，乃於昨日（四日）星期休假國立大學及各專門學校學生舉行遊街大會，以為國民對於外交表示誓爭到底。

五月七日，「民國日報」要聞欄對北京學生運動詳加報導，主標題為「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副標題為「人心不死，天道好還，賣國諸公，頗知懼否」？其後「民國日報」連日報導北京學生運動，主標題均為「北京學生愛國運動」。

五四學生運動，是攻擊親日的交通系，在當時政壇上，研究系與交通系對立，研究系的報刊對學生運動自然大力支持。如「晨報」彙集刊布學生致巴黎專使、巴黎和會、以及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報紙、各學校電，主標題

題名為「學生界之前仆後繼」。⁶³又如六月三日學潮擴大，次日「晨報」二版緊要新聞「學界風潮忽又擴大」條云：「……前此學生之講演團為軍警所取締，至於不能活動，乃以販賣國貨為實行愛國之唯一方法，詎料此售賣國貨之學生，前日忽有多人被捕。」凡此都可看出，該報在新聞處理上，明顯地支持學運。

另一方面，由於學生運動的目標是反日，日人所辦的報紙自然不支持學生運動，以北京「順天時報」為例，在新聞處理上，絕不同情學生，如1919年5月5日的一則新聞標題為「北京學生大騷動」，在新聞報導中有「其中暴烈份子遂舉火焚房」、「曹氏得脫此厄，未遭羣眾之毒手」、「教育總長聞信馳往阻止，竟被斥逐」等語。5月7日的一則新聞標題為「學生騷動後之所聞」，中有「聞司法界中人物此次因章氏無故被學生加以暴行，頗為憤慨，故擬依法起訴，並根究嗾使學生騷動之主要人物，以憑治罪」。又如5月9日的一則新聞，題名「某要人之學生行動談」，內云：

據旅滬某要人云：北京學生團此次之暴動，益足以助長中日兩國感情之隔閡，且實開兄弟鬩牆、引虎入室之端，恐來不測之結果。吾輩為將來前途計，實不堪痛心之至。本日新聞均有記載，該事就中如民國日報揭載挑撥的論調，尤為不謹慎，似此言論界之態度，決不免煽惑愚民之罪云云。

5月16日的一則新聞，題名「此次外交風潮因果談」，內容云：

某君就排日氣勢之增長曰：所以釀成今日之狀態者，政府固不能辭其責，而政黨政客皆因飯碗主義，直接間接從中嗾使或極力煽動，亦與有大力也。

5月23日的一則新聞，題是「學生罷課之內幕」，內有云：

研究系原來之目的，本欲倒閣，倒閣不成，則希望改組內閣之一部分，范長教育、汪長交通、熊或林長財政，乃為該派最小限度之希望，及見政府提出安福系之田應璜為教育總長，……非出死力以爭不可，遂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鼓動學生，於眾議院預定投同意票之前一日，一律罷課，並派人到處演說，以壯聲勢。

由以上所舉各例可以看出，「順天時報」在新聞處理上，是從不同角度醜化學運。或指學運暴烈、非法，或指學運受政客指使，或指學運妨害中日邦交。與讀「大公報」、「民國日報」、「晨報」等完全支持學運者不同。

⁶³ 民國八年5月11日「晨報」。

3.新聞報導的基本精神

新聞報導，就文字而論，可分為兩部分，一為新聞稿之內容，包括採訪的角度和廣度；一為以什麼樣的編輯手法，將新聞呈現出來。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新文化運動時期新聞報導的基本精神，可以從四方面加以說明：

其一、開闢專欄和專刊，使報導專業化：報紙的新聞，最初以政治新聞為主，其後為應合專業的需求，逐漸開闢專欄和專刊，於報紙中的特定版面，分別報導一種專門新聞。中國報紙的專欄和專刊，大多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開闢出來。上海「申報」在1919年增出「星期增刊」，1920年增出「常識」，1921年增出「汽車增刊」，1924年增出「本埠增刊」、「教育消息」、「商業新聞」專欄。上海「新聞報」於1922年有「經濟新聞」欄，於1923年有「教育新聞」欄，於1926年增加「本埠附刊」。上海「時事新報」於1913年有「教育界」欄，於1920年有「工商之友」欄（後改名「工商界」）。上海「商報」於1926年有「商業金融」欄。^④

其二、注意新聞的多層面，增加新聞的多面性：就新文化運動時期來看，主要的表現有三方面，一方面的表現是：對一件事情的發生，盡量探索各有關人等的活動與反應，此處僅以上海「時報」與北京「晨報」對五四學生運動的報導為例，加以說明。「時報」對學生運動連續廣泛的報導，5月8日的一則報導題名「學生團對外之怒潮」，分十三方面報導五四學生運動發生以後的情形及各方面的反應：1. 5月5日各校學生開會商討進行方法的情形，2.各校校長對學生運動的態度，3.山東省議長及參眾兩院議員謁見總統力爭的情形，4.國務院開會商討應付學運之方，5.受學生攻擊逃脫後的曹汝霖、陸宗輿的狀況，6.被學生毆傷的章宗祥的狀況，7.天津學生響應的情形，8.學生呈遞美使文書之內容，9.國民外交協會致巴黎和會專使函，10.國民外交協會議決案，11.各校罷課的理由，12.被捕學生的姓名，13.學生被捕後的狀況。「晨報」對學生運動的報導更多，5月6日的一則新聞題名「學生界事件昨聞」，分為九方面報導；5月7日的一則新聞題名「學生界大事件昨聞」，又分為十二方面報導。

注意新聞的多層面，第二方面的表現是引述國內的其他報紙的新聞，分為中文版和西文版兩種，亦以五四學生運動為例。中文報紙方面，如5月7日上海「時報」報導北京學運新聞，在標題「北京學生之大示威」下，直接引述了「益世報」、

^④ 林大椿編「中國新聞史」頁255、265。

「京報」、「晨報」等之報導，次日續刊登「順天時報」之記載。西文報方面，5月8日上海「時報」報導北京學運，在標題「北京學生示威之西訊」下，直接引述了「大陸報」、「字林報」、「英文滬報」等之報導。

注意新聞的多層面，第三方面的表現是引述外國報紙的報導。如1919年5月6日「晨報」二版緊要新聞的一則新聞題名「山東問題決定之外報」，報導中引述了東京報紙對山東問題如何決定的一些說法，謂係日本提案、英法美三國妥協的結果。

其三、多加標題，能使讀者迅速掌握新聞要點：所謂多加標題，其較為明顯者有兩類：一類為多條同性質簡單之專電，如每一專電皆以個別標題處理，則版面支離；如標題太少，則無法使讀者迅速掌握新聞要點，在編輯上，乃將各條專電之標題，總匯在專電之前，譬如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運動發生後，5月7日的「民國日報」刊載本社專電十一條，每則專電少則十一字，多不過四十五字，乃於十一條專電前，加了十一條小標題，上下兩欄並列，非常醒目。這十一條匯集在一起的小標題是：一、章宗祥尚不肯死，二、曹汝霖情急吞金，三、一說曹汝霖逃津，四、各校學生爭自首，五、二千人圍繞警廳，六、各校長聯合會議，七、錢能訓竟要嚴辦，八、徐世昌禁止集會，九、軍府嚴詰親日派，十、北庭竟悍然賣國，十一、濟南勞動界之大激昂。讀此十一條標題，即可窺知專電之內容。

另外一類是新聞甚長，每段皆立一小標題，如1919年5月7日「民國日報」要聞欄報導北京學生運動，除主標題「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副標題「人心不死，天道好還，賣國諸公，頗知懼否」以外，新聞中之小標題依序為事前之預備、政法學堂之聚會、天安門前之狀況、全體學界之通告、整隊出發前之演說、由使館往曹汝霖家、打不死的章宗祥摔不死的曹汝霖、曹宅起火與學生被捕、北京大學之會議等。5月9日「民國日報」續報北京學生運動，除主標題「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副標題「學生仍未上課」、「恐將釀成罷市」、「對歐和會表示」、「老徐恐嚇學生」、「學生示威之第三日」，以及副標題之後的次副標題「拘留學生不釋」、「各界齊動公憤」、「罷課既無結果」、「恐怕還要罷市」以外，新聞中的小標題依序為對外怒潮影響之擴大、各方面對拘押學生之公憤、京師總商會之緊急大會、被捕後之學生、曹汝霖脫離逸史等。

其四、新聞標題持平，敘事冷靜，即於首尾有評論，亦不偏袒一方：此類新聞處理，散見各報，但同一報紙的新聞處理，未必都能把握此原則。1919年5月5日

「晨報」緊要新聞，報導五四學生運動，主標題為「山東問題中之學生界行動」；新聞敘事極為平實，即新聞末尾之評論，亦極持中：

觀綜以上消息，學生舉動誠不免有過激之處，但此事動機出於外交問題，與尋常騷擾不同。羣眾集合往往有逸軌之事，此在東西各國數見不鮮，政府宜有特別眼光為平情近理之處置，一面努力外交、鞏固國權，謀根本上之解決，則原因既去，不致再生問題矣！

此後上海「時報」連續報導學運，標題及記事均能相當持平。1919年5月8日「時報」要聞，主標題為「京潮再誌」，副標題為「政學軍警各界之會議」、「外交協會開會被阻」等。5月22日「時報」要聞，主標題為「北京學界風潮之擴大」，副標題為「罷課者十八校」、「學生共三萬六千人」，而新聞中插入之標題，依序為罷課之經過、罷課後之大學、罷課後學生之行動、罷課之繼起者、高師之緊急會、罷課之宣言等。此外天津「大公報」對學生運動之報導，亦有持平之記載，如1919年6月8日該報緊要記事欄，報導武昌的學運，主標題為「武昌學運大激潮」，副標題為「軍民兩署之勸戒」、「被捕學生之釋回」。

其五、指斥政府檢查新聞、封閉報紙，表現爭取言論自由氣志：新文化運動時期，政治環境不良，報紙因受威逼利誘，加上黨同伐異，很難維持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威逼的例子，如1918年9月24日段祺瑞政府由曹汝霖與日代表西原龜三簽訂中日濟順、高徐兩鐵路借款及參戰借款，25日北京「中華新報」、「國民公報」、「晨鐘報」等八家報館，因登載此事，而以「意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故意造謠，洩露秘密」等罪名，同時被查封。^{⑥5}利誘的例子，如1922年交通部津貼各報館的金額達十二萬五千元之多，1925年段祺瑞政府津貼報館125家，每家50至300元不等。^{⑥6}儘管環境如是惡劣，仍有不受威逼利誘的例子，1921年上海「時事新報」在發行第五千號紀念詞中有云：

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上之補助，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之支配。……吾儕相與自矢，無論經濟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吾儕十餘年守此苦節。^{⑥7}

此為不受利誘的例子。至於不受威逼的例子，如1919年5月23日起警方派員檢查「

^{⑥5} 謝蕙風「民國初年新聞自由研究（1912-1928）」頁102。

^{⑥6} 同上，頁109。民國十年5月18日胡適日記謂，北京晨報受新交通系津貼，見「胡適日記手稿本」，第一冊。

^{⑥7} 同謝蕙風上文，頁24-25。

晨報」新聞稿，「晨報」即於5月24日以後連續登載「本報特別廣告」或「本報特別啟事」揭露其事。24日廣告云：

昨晚八時京師警察廳派員會同外右四區署員到本報館檢查發稿，所有各項新聞稿件，須經審查後方准登稿，在此監督狀態之中，凡讀者諸君極感興趣、極欲聞知之言論事實，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而二十五日該報，即揭載北京「益世報」因獨家登載魯軍人痛外交失敗之通電被封之新聞。

其六、能透露敵方對衝突事件之反應：此為前述新聞能從不同角度加以報導的特別例證。通常敵我交涉或衝突，我方報紙僅從我方立場加以報導，新文化運動時期，已有注意敵方反應之新聞，如巴黎和會對於山東問題依據日本要求決定後，日人狂喜，1919年5月5日「晨報」報導此事，主標題為「於瀕危候之山東問題」，副標題為「日本輿論之狂喜，我政府亦有所聞耶？」

其七、記者能及時承認錯誤，以免新聞前後不一，欺騙讀者：1915年5月12日「申報」載有5月8日黃遠庸所寫的「新聞日報」云：

昨函記日本送到通牒，公府開特別會議。又電告通牒內容，以是時匆忙，故所報告不免有所錯誤，至晚間則詳實之內容均已探悉，而又不及再發函電，至今日余已得其全文，複寫如下。

此種公開承認錯誤的精神，不僅在當時報紙中不多見，即今日報紙，除來函照登外，亦少有所聞。

四、報刊言論之方向與基本精神

1. 報紙言論的方向

報紙言論有兩大類：第一大類為刊於新聞版的言論，有社論、時評、論評、評壇、論說、來論、外論、選論等目，皆與時事有關。第二大類為刊於副刊或其他增刊的言論，值得介紹的，多與新思想的提倡、新觀念的輸入有關，當然也有許多是與時事有關的。

刊於新聞版的言論，由於需配合新聞的性質，題目繁多，無法一一分析。茲僅就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新聞版言論，舉兩個主題，加以討論。一個主題有關中國在巴黎和會收回山東利權失敗，另一個主題是因收回山東利權失敗所引發的學生運動。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評論，各報紙的方向有的齊一，有的分歧，往往受國家立場

和黨派立場所影響。

1919年5月初，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交涉山東問題瀕臨失敗，「晨報」於5月8日刊載「山東問題之外報論調」，說明問題癥結所在。引英文滬報云：「中日問題當由中國與日本自行解決之，此即日代表之所力爭，而亦中國代表之所力持反對者也。……彼日本所以欲與北京直接解決者，以東京政府確知北京可藉行賄於親日派官吏及軍人以操縱之」。引華北明星報云：「前德國在山東省內所有之權利若歸日本處分，中國將不簽字於和約。……若不規定直接以膠州交還中國，則現在巴黎代表將不簽字於和約。」五月九日「晨報」對內閣引咎辭職事發表論評「山東問題與內閣辭職」云：「茲事失敗，……內閣引責辭職，於外交仍無絲毫裨補，冀錢內閣……對於山東問題，力從國人所主張，責令專使，終勿簽字。」5月11日「晨報」為激動民氣支援外交刊載選論「全國民快去毒」云：「近日大家發狂熱，奔走呼號，問他為的是什麼，說道為的是青島問題，眾位要知道，這不但是青島問題，是山東全省問題。……山東問題是全國問題，不能說山東不是我的家鄉，我便不管了。……現在我們要督促政府，照我們國民的意思去辦，不可再放鬆一步。」由上引可以看出，「晨報」對山東問題交涉的基本態度：從了解問題真相，到責令政府勿簽字；如政府要簽字，國民迫令政府勿簽字。

以國民的力量迫令政府勿簽字，1919年5月9日「民國日報」刊載沈玄廬「解決山東問題的眞力量」一文，有很好的發揮。文中有云：「這學生的力量，和工人的力量，總和起來，一個絞腦筋，一個運肌肉；一個揮筆頭，一個拿銼刀。一般國民，齊心併力，學著他們做去，便是解決山東問題的眞力量。」

香港「華字日報」，對山東問題的交涉，亦採極端排日之態度，且有如當時輿情所趨，因對外交涉失敗，而移怨政府中的親日派。當時上海總商會有派員與日本磋商交還青島之建議，1919年5月12日「華日字報」發表論說以關之，題名「我國無與日人磋商交還青島之理由」。5月14日、15日「華字日報」更連載論說「誰眞賣國」，直指曹汝霖、陸宗輿等賣國，並謂「今日之事，以討賊爲第一義，以對外爲第二義。」

前述三報的若干言論，可以看出在山東問題交涉中，輿論監督政府、激勵國民之一斑。但日人所辦的「順天時報」，對山東問題的評論則異於是。謂中國所主張的兩點：（一）青島由德國直接交還，（二）民國四年、七年之中日協定無效，中

國方面有理由，日本方面亦有種種反對理由。⁶⁸又謂山東問題始於一派政治家之煽動欺罔，致有誤解。⁶⁹此亦可看出，國家利益與黨派立場，對報紙的言論方向影響至大。

至於對學生運動的評論，其情形亦如評論山東問題，受國家利益和黨派立場所左右。日人所辦的「順天時報」，於1919年5月7日論說發表「學生之暴行」，於5月9日、10日、11日論說發表「學生暴行與政客之煽動」，於5月12日論說發表「學生暴行與司法權之獨立」，於5月15日論說發表「學生之本分」，於5月30日論說發表「教育界之暗黑」，於6月17日論說發表「學生政治運動為政治家之恥辱」等，從不同角度，批評學生運動。但中國人所辦報紙，至少在當時屬於進步的報紙，都對學生運動表同情，甚至激勵學生再接再厲，以達到更遠大的目標。較溫和的「晨報」於1919年5月9日在評壇中發表顧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精神的潮流」，認為舊秩序為發生危險的條件，維持舊秩序的法律無存在價值，並肯定學生運動為青年精神潮流的新趨向。5月11日「晨報」於外論中發表涵廬的「學生事件與國家法律問題」，亦認為當時國家的法律，不許人愛國，不許人保全領土，已不能和正義結合。5月14日涵廬再於時評欄發表「再論學生事件與國家法律問題」，對「順天時報」主張將學生送交法庭的理由，一一加以駁斥，堅持「正義可以裁判法律，法律不可以阻攔正義」。

「民國日報」的立場更為激烈。1919年5月7日由葉楚傖署名的社論，題名「五月七日之神」，文云：「今天是五月七日，是袁世凱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紀念日。……加著歐洲和會裏，突然傳出消息來，……山東已不是中國人的山東了。……北京原是個染缸，……獨有學界，在萬鈞壓力下，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來。這是五月七日之神，這是中國的恩人，這是山東問題瀕危中救命的丹方。……誓與被捕的學生，同生共死。……北京學生的性命，便是中國的性命，要救中國，該先救被捕的學生。」5月10日，葉楚傖再署名發表社論，題名「討賊救國之責未已」，文云：「學生本無罪，釋放學生不得謂北庭之恩。……學生之志，懲辦國賊，保存山東之志也。國民之志，熟曰不如是，既以此為志，則今後之責任正重。本最近振奮之精神，以力求根本目的之達到。」

報紙副刊或其他專刊的言論，雖不配合時事，所論多為新事物、新思潮。此處

⁶⁸ 1919年5月9日「順天時報」，學生暴動與政客之煽動。

⁶⁹ 1919年6月18日「順天時報」，學生風潮漸次鎮靜。

略舉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和「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中的部分言論為代表。

「晨報」副刊對新文化運動有影響，主要在1919年2月7日增加了介紹「新修養、新知識、新思想」的「自由論壇」和「叢談」兩欄以後。到1921年10月12日第七版副刊改為四開單張，才以「晨報副鑄」著名。「晨報」副刊除經常刊載有關新文學的譯著（魯迅的「阿Q正傳」即在「晨報」副刊連載）外，經常發表論述社會主義、實驗主義、勞工問題、青年問題、以及婦女問題的文章。^⑩在論述社會主義方面，「晨報」副刊的「馬克思研究」專欄，從1919年5月5日起，至是年11月11日止，共六個月，發表了五篇作品，大部分是介紹馬克思主義，也有一篇是批評馬克思主義。1922年5月5日「晨報」副刊出版了「馬克思紀念」專號，1922年11月7日，又出版「俄國革命紀念」專號。此外，「晨報」副刊也發表了許多各派社會主義的文章。^⑪

在討論實驗主義方面，1919年5月10日、11日「晨報」副刊發表潘公展記錄、胡適講述的「實驗主義」。1921年11月17日，胡適在「晨報」副刊發表「好政府主義」一文，謂好政府主義是一種工具政府觀，文云：「人類是造工具的動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種；這種工具的特性，是有組織、有共同目的的權力，這種工具的效能，可促進社會全體的進步。」好政府的基本條件，是「要有公共的標準，要有好人的結合」。到1922年5月，胡適聯合王寵惠、丁文江等在「努力週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晨報」加以轉載），進一步闡明好政府主義，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個公開的政治，並提出實行這種好政府的唯一下手功夫，便是勸所謂好人，不要自命清高，勸那些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出來奮鬥。^⑫

關於勞工問題，1919年5月1日，「晨報」副刊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為中國報刊第一次紀念這個節日。1922年5月1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發表「五一紀念日於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主張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假期停工給薪、男女同工同酬、取締童工等。^⑬

關於青年問題，1919年3月14日、15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發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鼓勵青年採取「尊勞主義」，到最受壓迫、最痛苦的勞動羣眾中

^⑩ 「五四時期刊介紹」第一集，頁99-100。

^⑪ 同上，頁102-103間照片及頁114-115, 124-125。

^⑫ 「五四時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11-112。

^⑬ 同上，頁102-103間照片及頁105。

去，因為那裏最黑暗、悲慘、寂寞。是年4月12日「晨報」副刊發表「青年學生的危機」一文，力勸青年們進行活動決不依靠已成的勢力，而要結合同志創造一個正當的新勢力，創造新的生活。^⑭

關於婦女問題，1919年到1920年間，「晨報」副刊發表了不少討論婦女問題的文章，如1919年5月6日至10日康白情的「大學宜首開女禁論」、5月11日羅家倫的「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5月18至19日易君左的「何謂女子問題」、5月26日潛龍的「我看婦女問題」、6月8日至9日楊鐘健的「婦女問題的先決問題」、6月24日潘公展的「中國婦女是有人格嗎」、12月2日王光祈的「改革舊家庭的方法」、12月8日琴韻女士的「婦女解放的首要辦法」等。這些文章，一方面從不同的角度揭露了中國婦女地位的低下，以及婦女受壓迫、受摧殘、受侮辱的情形，一方面也主張從注重婦女人格、使婦女有受教育的機會、提高婦女的能力、解決婦女職業問題、爭取婦女參政等來解放婦女。^⑮

「時事新報」的學燈，亦為研究系的刊物，但立場似較「晨報」副刊為保守。迄於1923年間，學燈的先後主編為張東蓀、匡僧、俞頌華、郭虞裳、李石岑。學燈的發刊旨趣為促進教育、灌輸文化，有關教育界報導和評論佔很大的篇幅。學燈態度溫和，1918年9月30日在「本欄之提倡」中表示，「於原有之文化，主張尊重而以科學解剖之」。對舊文化的態度，張東蓀主張自然淘汰，他說：「我們共認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盡量充分的把它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因為他們自然而然而會消滅的。」（1918年12月14日「時事新報」，新與舊）匡僧主張尊理性而遏感情，求真理勿爭閑氣（1919年3月20日「時事新報」，辯論者之態度），也是一種非鬪爭的自然淘汰主義。此一溫和的態度，受到「新潮」的批評（見「破壞」、「答『時事新報』記者」），張東蓀發表「不罵主義之勝利」（1919年一月20日「時事新報」），以堅持自己的主張。^⑯

學燈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當北京大學有驅逐陳獨秀、胡適等四位新派教授之傳說傳出後，學燈大抱不平，認為「今以出版物之關係，而國立之大學教員被驅逐，則思想自由何在？學說自由何在？」（1919年3月5日，為驅逐大學教員事鳴不平）儘管如此，學燈絕不贊成過激的言論，1919年3月11日在左舜生所撰的「聞

^⑭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07。

^⑮ 同上，頁110。

^⑯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北京，1959），頁272-274。

北京大學教員被逐消息警告各方面」中，規勸「新青年」說：「與國民心理不太相容之主張，錢（玄同）先生之廢除漢字論，亦宜出以鄭重，使新青年雜誌，日趨於樸實說理之一途，不與他人爭閑氣」。^⑦

學燈的內容，可於徵稿啟事中窺知一斑。1918年4月15日的一則徵稿啟事，徵求對教育之意見及出版物之批評。1919年6月17日的一則徵稿啟事，徵求對社會問題、勞動問題、產業組合（工會）、婦女問題之意見。^⑧從實際發表的文章看來，學燈討論了學生運動，雖有贊同，但基本反對；討論了新村主義，意見很多；討論了工讀互助，提出各種辦法；介紹各派社會主義，但反對過激派。^⑨

譬如關於學生運動，1920年4月，全國學生因要求北京政府駁回日本關於山東問題直接交涉的通牒而舉行罷課時，學燈公開反對。在1920年4月26日發表的「本報對於此次風潮之意見」中說：「以言罷課，則破壞教育有餘而制人不足。以言罷商，則損失或逾所得，且亦斷難持久。以言罷工，則不能制政府以死命之工雖罷亦無足輕重。」同時，學燈還於1920年5月7至9日轉載「晨報」之文「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蔣夢麟、胡適著，原載「晨報」，1920年五四紀念號）和於1920年5月7至12日轉載「新潮」之文「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羅家倫著，原載「新潮」2卷4號），這兩篇文章，亦均反對學生運動。^⑩雖然如此，學燈並不忽視青年的社會責任，1920年4至6月間，學燈曾鼓勵青年「去與勞工為伍」和「往田間去」，是青年作者鼓吹的。^⑪

關於工讀互助，張東蓀認為工讀主義的發生，不是因為尊重勞動的新人生觀或泛勞動主義思想，而是有許多青年的家庭無力量使他們求學。^⑫

學燈基本上是抱持改良主義，而對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風潮，1919年4月1日至2日，學燈發表張東蓀的「社會主義與中國」一文，主張「把那些能惹起社會革命的材料一概除去」，他的辦法是：在政治上，以民治主義代替專制政策；在經濟上，要預防資本家壓制勞動家，預防資本的壟斷，使勞動家積有資產。^⑬張東蓀所主張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1921年以後，張東蓀等在學燈「社會主義研究」專欄

^⑦ 同上，頁274。

^⑧ 同上，頁502、504。

^⑨ 同上，頁276-279, 283。

^⑩ 同上，第三集，頁284。

^⑪ 同上，頁281。

^⑫ 同上，頁279。

^⑬ 同上，頁282-283。

中，便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新青年」和「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都抨擊學燈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闡揚，「新青年」甚至指出「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主張資本主義的別名」。⁸⁴

對五四時期較為觸目的勞工問題，學燈討論不多。1920年1月，「時事新報」創刊「工商之友」副刊逐日刊行，此副刊的宗旨，乃在減少勞資衝突。1920年3月21日「工商之友」刊載「中國資本家今後的覺悟」，文中責備「資本家最錯誤的手段，就是苛待工人，不知道工人的健全不健全、快樂不快樂、生活寬裕不寬裕，在資本家利害關係上，和實業的發達不發達上，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工廠應當爲了自己的利益增進工人的幸福，「非獨用不著強硬手段去壓迫他們，督率他們，他們必定自然而然的情願替工廠出力。」⁸⁵到1921年4月，「工商之友」與「時事新報」的「經濟界」合併，定名爲「工商界」，⁸⁶此後更少討論勞工問題。

學燈基本上是從學術、文化、思想等方面做啟蒙的工作，1920年5月22日，學燈編輯李石岑在「學燈之光」中，詳盡闡述了「學燈」對新文化運動的一貫看法，他認爲一年來新文化運動的缺點就是「思想之淺薄」，而矯正的方法是「第一、在督促國人注重學問的生活，第二、在聯絡富有學識之人，共營編譯之事業。」他說：「學燈之主義與理想，爲學術的根本研究。……務去淺薄思想，以建造無限之人生。」⁸⁷爲了學術的根本研究，1921年9月間，學燈將版面分成「文學研究」、「哲學研究」、「文字學研究」、「科學常識」、「詩」、「小說」和「社會主義研究」等欄。1921年9月16日，「社會主義研究」從學燈分出來，成爲獨立的旬刊，繼續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此後學燈就成爲以哲學、教育學、文學理論和文藝創作爲主要內容的刊物。⁸⁸

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新文化運動有重大貢獻的四大副刊，除「京報」副刊以文學爲主外，「學燈」較爲保守，「晨報」副刊較爲進步，「國民日報」的覺悟較爲激進。「覺悟」創刊於1919年6月16日，由邵力子主編。早期的覺悟每期只佔四開一版的大半頁，1920年起改爲四開兩頁，5月20日起改爲單行的八開對折四頁，內

⁸⁴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25。

⁸⁵ 同上，第三集，頁293。

⁸⁶ 同上，頁298。

⁸⁷ 同上，頁284。

⁸⁸ 同上，頁285。

容有評論、講演、選錄、譯述、詩歌、小說、通訊、隨感錄等。⁸⁹「覺悟」所以較為激進，因為它的母報「民國日報」原為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此報創於1916年1月，此後迄於1923年間，該報在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報導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以及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介紹俄國革命和蘇俄建設等方面，多所盡力。1924年國民黨容共後，一些共產黨員加入報社工作，使報紙左轉。1925年西山會議後，「民國日報」在葉楚傖的影響下，始進行反共。該報到1932年停刊。⁹⁰

「民國日報」的由緩進到激進，也反應在「覺悟」副刊上。1919年間的覺悟，一般作者的政治理想，基本上還是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主義思想。1920年起，「覺悟」的社會主義傾向愈來愈明顯。到是年底，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影響下，「覺悟」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指導思想。⁹¹

能表現「覺悟」激進傾向的，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社會主義的衛護，一是對工人利益的支持。從1919年開始，「覺悟」就不斷對勞動問題、知識份子和勞動人民的關係、以及工人運動加以討論，對1920年和1921年的五一勞動節，「覺悟」都出版了紀念特刊，宣傳八小時工作制的意義、對官廳禁止工人開會表示憤慨，並對勞動節加以歌頌。⁹²

至於對社會主義的維護，1920年11月6日，張東蓀於「時事新報」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批評社會主義，主張開發實業，「覺悟」於1920年11月7日發表「評東蓀君的『又一教訓』」，8日又發表「再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來加以反駁，批評張東蓀的資本主義傾向。⁹³

2. 期刊言論的方向

期刊的言論，略如報紙的副刊言論，一般而言與時事的關係較遠。新文化運動時期期刊所評論的，其影響較大者，常是與新文化運動有直接、間接關係的事物。此處以三類期刊為例，說明其鼓吹新文化運動的情形：一類是較為激烈的，包括「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一類是較為中庸的，包括「星期評論」、「建設」；一類是較為溫和的，僅舉「解放與改造」一種。

較為激烈的期刊，以「新青年」影響最大。「新青年」的內容除1920年以後因

⁸⁹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84；呂芳上「革命之再超」頁84-86。

⁹⁰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82；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83-84。

⁹¹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86、188；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86-87。

⁹²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200、202、208-209。

⁹³ 同上，頁195。

偏向馬克思主義不計外，1915年9月15日至1922年7月1日的九卷「新青年」，可分三個階段來觀察，茲將每一階段各類文章的篇數列表比較如下：^④

篇數 階段別	類別	青	文	反	民	科	西	西	社	馬	其	總
		年	學	儒	主		方	洋	會	列	他	計
		改	革	反	政	學	思	文	主	主		
		造	命	孔	治		潮	學	義	義		
第一階段， 1-3卷:1915 9.15.-1917 8.1.		25	7	26	20	12	37	33	0	0	21	181
第二階段， 4-6卷:1918 1.15.-1919 11.11.		7	40	27	8	14	21	33	6	9	8	173
第三階段， 7-9卷:1920 12.1.-1922 7.1.		2	30	7	14	6	42	31	68	33	0	233

「新青年」一卷一號，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項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⑤當時理想雖高，言論尚稱穩健，故在創刊的社告中，亦僅言「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想盡心灌輸」，「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⑥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

^④ 據郭武平「新青年雜誌與民初中國意識轉變」（民國69年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59 統計。

^⑤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 2。

^⑥ 同上，頁 382。

前夕，「新青年」的主要言論，除提倡民主、科學外，便是攻擊舊禮教、舊文學、舊藝術、舊政治，而立場非常堅決，故在1919年一月六卷一號所發表的「本志罪案的答辯書」中，一方面謂：「本志同仁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⁹⁷另一方面則謂：「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⁹⁸到1923年6月，當「新青年」於九卷出完停刊一年之後重新復刊之際，發表「新青年之新宣言」，便聲言要「為中國真革命思想的先驅」，要「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⁹⁹

大體說來，「新青年」一卷至七卷（1915年9月15日至1920年5月1日），內容是多方向的，以鼓吹青年改造、攻擊舊禮教、討論婦女問題、介紹西洋學術思想等為主。¹⁰⁰關於鼓吹青年改造，如1916年9月1日出版的二卷一號「新青年」載有李大釗的「青年」一文，號召青年「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改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關於攻擊舊禮教，「新青年」一創刊，就對推動中的孔教運動大加批判，陳獨秀在一系列反對孔教的文章中，反覆說明三點：其一、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尊孔必將導至復辟；孔子思想不能適應現代生活。其二、尊孔、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的原則。其三、定孔教為國教違反宗教自由的原則。¹⁰¹魯迅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要著作，絕大部分在「新青年」發表，他的雜感、小說和論文，從生活的觀察出發，充分暴露舊禮教的罪惡。¹⁰²吳虞在「吃人與禮教」一文中說：「我讀『新青年』裡魯迅君的『狂人日記』，不覺得發生了許多感想，我們中國人最妙的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講禮教。」吳虞在文章中提出許多中國歷史上的吃人故事，¹⁰³來諷刺此禮教之國。關於討論婦女問題，如五卷一號（1918年7月15日）發表胡適的「貞操問題」，該文認為貞操是男女雙方交互的道德，不能偏於女子一方面，並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¹⁰⁴

⁹⁷ 同上，頁9。

⁹⁸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頁275。

⁹⁹ 同上，第一集，頁390。

¹⁰⁰ 同上，頁11。

¹⁰¹ 同上，頁3-4。

¹⁰² 同上，頁5。

¹⁰³ 「新青年」六卷六號（1919年11月1日），頁578-580。

¹⁰⁴ 頁5-14。

六卷三期（1919年3月15日）發表張崧年的「男女問題」，主張男女關係以愛情爲上，結婚應完全自由。^⑥

「新青年」的作者，最初都有志於中國新文化運動，對於政治，除泛泛的民主觀念外，初無具體的主張。到1917年共產黨人在俄國革命成功後，作者羣的政治意見便逐漸不同，最顯著的是自由派的胡適，與轉向共產主義的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分道，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五卷五號「新青年」發表李大釗的「Bolshevism 的勝利」、「庶民的勝利」讚揚俄國共產革命，胡適便在1919年4月15日出版的六卷四號「新青年」發表「實驗主義」，強調世界是一分一毫、一點一滴地成長起來，所需要的也只是各個個人的一分一毫、一點一滴的改良，否認有根本解決的可能。1919年5月由李大釗主編的六卷五號「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1919年6月，「每週評論」編者陳獨秀被捕，胡適代之主編，即在1919年6月出版的「每週評論」31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此後「新青年」愈趨激進，最後的八、九兩卷（1920年9月1日至1922年7月1日），都有「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討論」、「俄羅斯研究」等欄，大量介紹馬克思學說、各派社會主義理論、以及俄國的現狀。到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間重新出刊的一至四期「新青年」，以及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間重新出刊的一至五期「新青年」，則完全成爲宣傳共產主義的工具。^⑦

作爲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導刊物「新青年」的發展趨勢是從思想到行動、從改革到革命、從民主到無產階級專政、從社會意識到政治意識、從社會力量到政治力量、從和平到暴力。^⑧那個時期可以說是激進主義當道，「新青年」的影響力大，也是因爲它的激進態度。

創刊初期與「新青年」言論方向略同的是「新潮」，它提倡科學思想、懷疑思想和個性解放，反對傳統禮教，反對舊文學，也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⑨「新潮」創於1919年1月，停刊於1922年3月，計出十二期。共發表文章 394篇，其中文學譯著136篇，外來思潮譯著 72篇，有關傳統批判與社會改造的文章 57篇，有關科學與民主的文章 6篇，有關宗教與人生觀的譯著 9篇，其他28篇。^⑩一卷一號至

^⑥ 頁320-324。

^⑦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5，又頁424-454所刊各期「新青年」目錄。

^⑧ 郭武平「新青年雜誌與民初中國意識轉變」頁236-239。

^⑨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75-76。

^⑩ 李惠惠「新潮雜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1918-1922）」（民國 75年6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22, 339。

二卷一號由傅斯年主編，二卷二號至四號由羅家倫主編，二卷五號至三卷二號由周作人主編。周作人主編時，編輯有孫伏園等。^⑩

「新潮」的編者認為思想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礎，傅斯年在一卷一號所發表的「人生問題發端」中說：「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會，再以社會的力量改造政治便是好多了。」羅家倫在二卷五號所發表的「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中也說：「以政治勢力改革政治是沒有用的，必須從改革社會著手，改革社會必須從改革思想著手。」^⑪

作為思想改革者，「新潮」是受「新青年」的影響而創刊，其言論態度，有些與「新青年」一樣激進，有些則較為溫和。較為激進的，如對於中國家庭與婦女問題的討論，傅斯年於一卷一號發表「萬惡之原」一文，攻擊中國家庭摧殘個性，「說他孩子一生下來那一天，就教訓他怎樣應時，怎樣舍己從人，怎樣做你爹娘的兒子，決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羅家倫在二卷一號發表「婦女解放」一文，主張打破「賢妻良母主義」，要女子「做他們自己的人」。^⑫較為溫和的，如「新潮」介紹西洋各種思想學說，並不熱衷馬克思主義；攻擊傳統之餘，也主張整理國故等。^⑬

「每週評論」是陳獨秀於「新青年」之外，專門為評論時政而辦的刊物，作者有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王光祈、胡適等。陳獨秀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李大釗有社會主義傾向，高一涵有資本主義傾向，王光祈有無政府主義傾向，^⑭胡適是自由主義者。「每週評論」對實際政治的意見是：對當時進行的南北議和無信心，對皖系軍人及所依恃的日本帝國主義加以反對，^⑮並支持學生運動。「每週評論」除發表的文章以外，有時也轉載報紙中的評論，轉載的文章，基本上也是反帝國主義的、反軍閥的、支持羣眾運動的，也是打抱不平的。譬如在五四運動期間，1919年5月8日出版的「每週評論」，有「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的特別附錄，附錄中選載了發表於北京「晨報」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潮流」（顧兆熊）、「市民運動的研究」和「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

^⑩ 同上，頁317-318。

^⑪ 同上，頁301。

^⑫ 同上，頁302。

^⑬ 同上，頁304-305。

^⑭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43-44。

^⑮ 同上，頁44-45。

題」，發表於北京「國民公報」的「論學生事件」（梁漱溟）、「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和「學生無罪」，發表於北京「益世報」的「學生示威感言」和「大總統果欲置學生於法耶」，以及發表於北京「新民報」的「活法律與死法律」等，基本上都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又如5月26日出版的「每週評論」有題名「山東問題」的專欄，發表有「五四運動的精神」、「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外交失敗聲中的怪現象」等文，其基本主張有如「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一文末兩句所強調的：「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每週評論」除評論特別的政治事件外，也刊載鼓吹社會改造等方面的文章，如1919年8月10日的「每週評論」，即發表有「女子解放與家庭改組」的長文。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期刊，在立場上較為進步、但不流於激烈，可稱為態度中庸的，以上海的「星期評論」和「建設」為代表。這兩個刊物，都是孫中山和國民黨指導和經費支持下所辦的刊物。「星期評論」創刊於1919年6月8日，停刊於1920年6月6日，由戴傳賢、沈玄廬主編，共出53期，另出有1919年雙十節紀念號。該刊隨「民國日報」附送。該刊的基本目的是從預防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出發，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和勞動問題。沈玄廬是唯心主義者，在執筆所寫的發刊詞中，認為世界是人的思想創造的，社會變革的起源是人的自覺。戴傳賢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在第二號「國際同盟和勞動問題」一文中，宣揚傳統中國的階級平等、互助、仁愛思想，來抵制階級鬭爭學說。^⑩

「星期評論」共發表詩文412篇，計國內問題評論38篇，國際問題評論15篇，蘇俄問題15篇，新思潮56篇，勞動問題45篇，婦女問題19篇，文學問題7篇，小說11篇，白話詩55篇，雜文151篇，主要作者有戴傳賢、沈玄廬、李漢俊、朱執信等。^⑪

「星期評論」主張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認為這是救濟中國的根本辦法。戴傳賢在第一號「國民自給與國民自決」一文中說，要達到政治上的國民自決，必須有經濟上的國民自給，「中國人能够不靠外來的工業品可以自存，那麼中國人方才有經濟上的獨立權，方才有主張國民自決的勇氣，方才有實行國民自決的力量」。^⑫孫中山在1919年雙十節紀念號上發表「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認為「欲圖中國

^⑩ 同上，頁162-166。

^⑪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56-57。

^⑫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71。

實業之發展者，所當注意之問題，即資本與人才而已」。^⑩

「星期評論」對勞動問題甚為關心，戴傳賢於創刊最初的七個月中介紹了國際勞動的思潮和現狀以後，又於1920年2月1日出版的「星期評論」中發表「中國勞動問題的現狀」，於1920年4月25日出版的「星期評論」發表「五月一日略史」，並於是年5月1日出版了十大張的「勞動紀念號」。「星期評論」並不鼓勵階級鬭爭，把中國工人運動限制在縮短工時、提高待遇、限制童工、男女同酬、組織工會等方面，並要求資本家做調和工作，多做工人教育、工人保險、失業救濟等方面的事。^⑪

「星期評論」也關心婦女與青年問題。關於婦女問題，如戴傳賢由日文轉譯而來的、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皮爾遜（Pearson）的論文，題名「社會主義與兩性問題」，連續發表於1919年7月6日、13日、20日的「星期評論」，主張兩性關係主要因財產制度的改變而改變，而兩性經濟獨立平等之後，兩性關係即完全自由。如1919年7月20日、27日「星期評論」，連載各家對「女子解放從那裏做起」的意見，胡適主張從解放做起、胡漢民主張從經濟獨立做起、廖仲愷主張要靠女子自己奮鬥、劉大白主張從無家庭做起、戴傳賢主張從教育做起等。如1919年8月17日「星期評論」十一號刊載戴傳賢的「中國女子的地位」，從法律、政治、經濟、道德四方面分析中國女子地位的低落，並提出解放的呼籲。又如1919年10月5日出版的「星期評論」，發表「女子的新監獄」一文，直指以訓練賢妻良母為目的的女子學校為新監獄等。關於青年問題，如1920年4月18日出版的「星期評論」發表「學生運動的過去和將來」一文中，認為從1919年5月4日以來的中國，可以叫做學生運動的中國，強調學生運動是愛國的（保全中國利權）、文化的（普及科學、藝術等）、教育的（撤換校長、教員）、政治的（驅逐不良官吏，如湖南張敬堯），謂學生不怕被捕監禁，反以為榮。

當然，「星期評論」也是宣揚三民主義的。如1919年7月13日出版的「星期評論」第六號，載有廖仲愷的「三大民權」，即是鼓吹美、歐、澳洲等地某些地區所實行的創制權、複決權和罷免權，並勸請讀者讀8月1日即將出版的「建設」雜誌，俾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建設」雜誌是1919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創刊的，目的在宣揚國民黨的主義，

^⑩ 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紀念號第一版。

^⑪ 「五四時期刊介紹」第一集，頁175-177。

主要的社員有朱執信、廖仲愷、戴傳賢、胡漢民、汪兆銘等。孫中山在發刊詞中申明創刊此刊的目的在「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爲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爲易行之事功，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⑳

「建設」共出十三期，發表文章 132篇，有關建設方案及學理者 8 篇，有關三大主義闡釋者 23篇，有關國際問題者 10篇，有關社會主義者 31篇，有關新思想者 35篇，有關社會改造者14篇，有關文學改造及小說者11篇，所談多爲理論的層次，很少討論時事。^㉑

「解放與改造」是新文化運動中態度較爲溫和的刊物。該刊創於1919年 9 月，爲半月刊。1920年 9 月起，更名「改造」，出至1922年 9 月停刊。主編爲張東蓀、梁啟超（梁爲「改造」的主編），主要撰稿人有張君勱等。「解放與改造」於一卷一期發表「第三種文明」，認爲十九世紀以前的舊學說爲第一種文明，資本主義爲第二種文明，第三種文明是「互助與協同的文明」，社會上沒有階級的等次，經濟上以分配爲本位。^㉒

「解放與改造」引介各派社會主義之長，卻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當「新青年」一步一步走向馬克思主義時，「解放與改造」基本上仍傾向資本主義，雖然不願用資本主義一詞。張東蓀認爲「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發展實業，因爲中國唯一的病症就是貧困。」^㉓

1920年 9 月，「解放與改造」改名「改造」，編輯和撰稿人增加了梁啟超和蔣方震。梁啟超重寫發刊詞，主張保持私有財產、發展資本主義、提倡個人主義、注重平均分配、實行思想革命、從事文化輸入、反對思想統一（針對馬克思主義）。此後「改造」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減少，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特輯，如三卷三期的「廢兵問題研究」、七期的「教育問題研究」、九期的「軍事問題研究」、十二期的「制定省憲問題」等。^㉔

另外值得一提的，「解放與改造」對婦女解放問題也很重視，如一卷三期李鶴鳴的「女子解放論」，主張從婚姻、家庭、教育、經濟、政治等方面解放女子。一卷五期陳友琴的「女子教育之革新」，主張廢除賢妻良母的教育，使受教育者立於

⑳ 同上，頁221-223, 229-230。

㉑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65-68。

㉒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頁353-354。

㉓ 同上，頁21-23。

㉔ 同上，頁369-370。

自由平等之地位，以養成其自立、自主、博愛、互助之能力。一卷八期潛龍的「我國婦人問題」，從教育、職業、法律等方面探析問題的真相。同時，張東蓀的「婦女問題雜評」，主張社交公開、戀愛結婚和一夫一妻制。二卷四期沈雁冰的「評女子參政運動」，主張女子解放從道德的改革、家族的改革和社會地位的改革做起。

3. 報刊言論的精神

報紙的言論較為務實，即配合新聞的發展；期刊的言論，比較形而上，即謀求基本的改造。大體而言，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價值的言論，都是超乎法律的、超乎社會秩序的，主要因為當時的法律與社會秩序，已不能應合社會的需要。

當時報刊的言論，除了在威脅利誘下變節的，或因政治黨派利益有所偏頗的以外，最有價值的還是勇於批評時政的、勇於激勵國民的、勇於引介新思潮的、勇於批判舊傳統的。勇於批評時政，有剛和柔兩種類型，剛型是立論慷慨激昂，單刀直入，革命派的報紙如由鄧家彥主持的上海「中華民報」，和由葉楚傖、邵力子（名仲輝）主持的上海「民國日報」等都是。柔型的是批評時政不露鋒芒，而善於諷刺，如上海「時報」和「時事新報」，^{②⑥}以及北京「晨報」。剛型的言論，前已引述甚多，茲不再舉。柔性的言論，茲再引1919年6月5日「晨報」時評「咳！這是什麼景象」作為示例：「現在北京戒嚴，本報才經過監視，實在也不是我輩自由說話的時候，有這兩個原故，所以把本報的時評一門，簡直缺了兩禮拜有餘了。……若論學界的風潮，如今恰恰鬧得一個多月了。其始不過限於北京一隅，今則蔓延及於各地，果然政府的命令可以壓服得下，早就不該再有前昨兩日北京的風潮。……咳！記者不敢多言，又不忍不言。……希望政府、國民，對於這幾日的景象，稍為留神些方好。」

無論剛性批評還是柔性批評，在政治不自由的環境下，隨時都有危險發生。但是在新聞界，一直存在著不避危險、守正不阿的人，新文化運動時期也是一樣。1912年3月，戴傳賢在上海辦「民權報」，曾在編輯室的牆壁上大寫「報館不封閉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1926年9月，吳鼎昌、胡霖、張季鸞在天津復刊「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號召。^{②⑦}都可以表現報刊勇於批評時政的精神。

^{②⑥} 李贍「中國新聞史」（臺北，民國68年），頁354-359。

^{②⑦} 馮愛羣編「中國新聞史」，頁251, 267-268。

勇於激勵國民的，可以中國在巴黎和會中交涉山東問題失敗以及所引起的學生運動為例。如前所述，「民國日報」有文呼籲一般國民，向學生和工人學習，齊心併力，來解決山東問題。「晨報」有文呼籲「督促政府，照我們國民的意思去辦」；「每週評論」甚至有「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張。

勇於引介新思潮的，可以「新青年」、「新潮」、「星期評論」、「建設」為例。「新青年」發表文章 587 篇，前述分析，西方思潮（100 篇）、社會主義（74 篇）、馬列主義（42 篇）、民主政治（42 篇）、科學（32 篇）等合共 290 篇，均與新思潮有關，約佔全部篇數的 49.4%。「新潮」發表文章 304 篇，與新思潮有關者 72 篇，佔 23.7%。「星期評論」發表文章 412 篇，與新思潮有關者 56 篇，佔 13.6%。「建設」發表文章 132 篇，前述原分析中的新思潮（35 篇）加上亦屬新思潮的社會主義（31 篇），共 66 篇，佔全部篇數的 50.0%。

勇於批評舊傳統，可以「新青年」和「新潮」為例。如前分析，「新青年」發表文章 587 篇，與批評舊傳統有關者 60 篇，佔 10.2%。「新潮」發表的文章 304 篇，與批評舊傳統有關者 57 篇，佔 18.8%。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期刊，包括報紙的重要副刊或附刊在內，僅「五四時期的期刊介紹」一書（三鉅冊）所搜集者，已有 155 種，本文選為樣本加以討論者，不過九種。此九種期刊的文章與評論，雖有激進、緩進之別，牽涉的問題非常廣泛。就學科範圍而論，有文學、哲學、科學、教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宗教等；就各種主義而論，有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新村主義、資本主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就各種思想而論，有自由思想、平等思想、博愛思想、科學思想、懷疑思想等；就各種學說而論，有互助說、鬭爭說、競爭說等；就實際問題而論，有青年問題、勞工問題、婦女問題、家庭問題、教育問題、社會問題、廢兵問題、自治問題、聯邦問題、省憲問題、統一問題、外交問題等；就各種社會運動而論，有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等；就對傳統的批判而論，其對象有舊禮教、舊文學、舊宗教、舊政治、舊倫理、舊藝術、舊思想、舊道德、殉節守節、孔教、儒學等；就人生態度而論，有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實利的、世界的、科學的等。當時被嚮往的國家，是革命後的蘇俄；認為中國的改革之道，是以思想革命為基礎。看似多元，實有一元傾向，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時期言論的另一種精神。

在多元競逐的言論市場中，言論的偏頗是可以理解的。難能可貴的是，「時事

新報」的「學燈」副刊，提倡自然淘汰，不主張互相攻擊。1919年4月23日，「學燈」發表「本欄之主張」，申明「不妄助新派攻擊舊派，而對新派所持之主義加工研究，然亦不作無價值之調和論」。^②「學燈」也有自己的主張，如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宣揚，但對他人的主張則採取「不罵主義」。「學燈」也不贊同羣眾運動，完全從學術、教育及思想上下工夫，這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基本精神。

五、結 論

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政治上是各派軍人競逐政權，經常訴於武力及高壓，對於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思想的發展有不利的影響。在經濟上，基本上是自由企業的，但外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內受各派軍人橫徵暴斂和戰爭破壞，企業也很難有正常的發展。在社會上，有羣眾運動的興起，譬如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大體仍限於少數城市居民，廣大的農村，甚至城市中的多數居民，仍很保守。在文化思想上，基本上是對舊文化、舊思想的批判，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引進，當然在批判和引進中態度不一，有的全無保留，有的較為審慎。從新聞與評論的角度看來，新聞界對政界基本上是持監督的態度，甚至敵對的態度；新聞界對經濟發展問題，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是反資本主義的，即使主張採行資本主義優點，亦很少逕自提倡資本主義。新聞界對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關懷，關懷的對象以城市居民為主，對農村的關懷無多。新聞界對文化思想採兼容並包的態度，容許各家爭鳴、互相辯論，但也各有自己的主張，這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一種精神。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新聞界能够享有較多的自由，得力於下列三個因素：其一、上海、天津、漢口等地有租界，在租界內所辦的報刊，其言論雖為政府所不喜，因為法權不及，很難禁止，僅能在郵寄方面加以檢查。其二、各派軍人各有地盤，在甲地盤之報刊，對乙地盤的政治加以批評，乙地盤的當道無從干涉。其三、當時軍人當政，忽視文化思想問題，傳佈思想、學說的文章，只要不直接批評政治，很少受到禁止。雖然如此，當時犧牲的報人、查禁的報刊仍然很多，有理想的報刊和報人可以說是前仆後繼的。

當時著名的報人或記者，北京「亞細亞報」有黃遠庸，北京「京報」有邵飄萍，初任上海「大共和報」主筆、繼加入天津「大公報」工作的有胡霖，上海「民

^②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頁276。

國日報」有葉楚傖，上海「時報」有戈公振，上海「商報」有陳布雷，初主上海「中華新報」筆政、繼主天津「大公報」筆政的有張季鸞。黃遠庸原為「亞細亞報」的通訊記者，袁世凱帝制運動時期，因不欲為袁主辦「亞細亞報」，逃往美國，有人誤以彼支持帝制，在舊金山被刺殺。^⑳如前所述，邵飄萍因在國奉戰爭中支持馮玉祥的國民軍，為奉系軍人所殺。此外，1916年12月，廣州「南越報」因反對弛賭禁，觸怒當局，編輯人李匯泉遭刺殺。1918年7月，廣州「民主報」因載粵督莫榮新把持財政、破壞護法，記者陳耿夫以「挑撥軍心」遭槍決。^㉑這些都是政治迫害報人的例子。

至於封閉報館，1915年10月，廣州「覺魂報」和「廣東通報」，以及長沙「大公報」等，因反對帝制被查封。^㉒1918年9月，北京「晨鐘報」、「國民公報」、「中華新報」等因發表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款消息，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查封。^㉓1924年九、十月間，北京「大晚報」和「世界晚報」等因報導江浙戰爭消息以「淆亂視聽」的罪名被查封。^㉔這些都是政治迫害報紙的例子。

在政治迫害報人、報紙聲中，報紙、報人並不氣餒。如1918年9月北京「晨鐘報」被封後，於同年11月易名「晨報」出版。又如1926年4月「京報」主人邵飄萍被殺後，報紙停刊，到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抵北京後，邵夫人湯修慧將「京報」復刊，以紀念邵氏。^㉕這些都是報紙、報人前仆後繼的例子。

與報紙比較，期刊及期刊作者所受到的迫害較少。「每週評論」的編者陳獨秀曾因鼓動學生運動被捕，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等四人曾因傳佈新思想一度傳言將被解聘，這些均不能影響他們辦雜誌，亦不能影響他們傳佈新思想。

儘管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政治環境不良，與其他時期比較，新聞界仍是享有較多自由的時期。當時報紙、雜誌眾多，而且無論因財務不繼而停刊，還是因政治壓力而停刊，報刊總數日增。全國數百種報紙與雜誌，彼此對立、呼應、關注，已形成龐大的新聞界。新聞界的言論不一，影響較大者每有黨派立場。對政治的批評，敢言者多為政治上的反對派，不一定基於記者職責。較有深遠影響者，是許多期刊及

^⑳ 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頁48-52。

^㉑ 謝蕙風「民國初年新聞自由研究（1912-1928）」頁115。

^㉒ 同上，頁68。

^㉓ 同上，頁102。

^㉔ 同上，頁115。

^㉕ 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頁49。

報紙副刊和附刊從事思想革命和文化更新。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結束之後，無論是國民黨壯大，還是中共興起，都表示中國的政治發展已進入新時代。這正是「新潮」作者傅斯年所謂「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會」、「以社會的力量改造政治」的結果。